

【庆祝新中国成立8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长篇报告文学

陈启文◎著

共和国 粮食良 报告

湘潭大学出版社

【庆祝新中国成立8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长篇报告文学

陈启文◎著

共和国 粮食 报告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粮食报告/陈启文著.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1128-138-5

I. 共…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9859 号

共和国粮食报告

陈启文 著

责任编辑:阳 勇

封面设计:张 毅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xtup.xtu.edu.cn>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9.5

字 数:553 千字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138-5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目 录

引 子 人间食粮

第一章 以“暴风骤雨”为背景

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25

从南下到开国大土改/39

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啦/53

第二章 流金岁月

有了土地,也不是就有了一切/59

流金岁月的黄金法则/68

越迈越快的步伐/75

第三章 问苍茫大地

神话的诞生/84

失重的土地/99

别梦依稀咒逝川/106

问苍茫大地/113

正义与良知的实录/123

叫一声农民太沉重/136

第四章 复苏的田野

天理与真理/144

为了听到人民的声音/151

日子里的日子/159

第五章 最后的底线

最后的底线/168

大寨,中国农民的最后一面旗帜/178

第六章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187

太平口,那一座塔式方形碑/200

问渠哪得清如许/208

第七章 小岗村话语

去小岗村的路有多远/219

沉沦与觉醒/225

到秋天来看收成/236

小岗村话语/242

小岗之路,还能走多远/252

第八章 北大荒的太阳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265

把南泥湾搬到北大荒/278

北大荒啊,北大荒/295

北大荒的太阳/306

第九章 当代神农与东方神稻

袁隆平的那双眼睛/316

谢华安的那双脚/331

刘文炳的那双手/344

第十章 谁在养活中国

一滴露水养活一兜草/351

走进中南海的种粮大户/365

一个种粮大户的十万亩梦想/373

第十一章 吃饭比上天重要

吃饭比上天重要/381

天下大命/393

谁主沉浮/398

瓶颈中的突围/407

第十二章 跨越时空的透视

地球人都懂得的道理/416

东莞：非推广模式/433

跨越时空的透视/449

后 记

引 子 人间食粮

一

粮食是百感交集之物，凝天地精气，蕴日月精华，承雨露化育，方凝结而成，以济天下苍生。它是大地赐给人类无穷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一种让人类深怀着感恩之情和虔诚之心的信仰之物，用中国农人的话说，是命根子。

粮，望文生义，米之良者。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个简化字，其实，早在汉礼器碑（藏山东曲阜孔庙）和西陲简（四九一七）就有这个古老的“粮”字。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一个无法简化的汉字。而它在典籍中的出现，似乎一开始就与战争有关，“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墨子·鲁问》）。这样的战争是对粮食的直接掠夺。和“粮”一样，食，也是一个难以简化的古老汉字，“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诗·卫风·氓》）。郑玄笺：“女家乏谷食已三岁贫矣。”这是《诗经》时代对饥饿的记载，而且是长达三年的饥饿，也成了一种永远无法简化的存在。

在西方，诗人们把粮食喻为“太阳的血液”，这是我所知的粮食的最伟大也最形象的一个比喻，而且赋予其丰富的象征性。每个造物都表明上帝的存在，却没有一个透露上帝在什么地方。——这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法国作家纪德的一句名言，源出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人间食粮》。无疑，他所说的粮食是精神上的，而对于数千年来一直在贫苦和饥饿中挣扎的中国人，只有能够填饱肚子的粮食，才是我们的上帝。对于一个视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价值的。对农民而言，流汗，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真理一样确定不疑。除此之外，你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如果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一旦被颠覆，这个世界就将被颠覆。

在乡下，老百姓常常骂他们不知稼穡之艰辛的孩子：“不饿他两餐，这狗日的还晓得长记性！”饥饿，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也是一种提醒。其实，不

必如此提醒和强调，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岁月的烟尘中永远无法湮没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五千年的饥饿！

饥饿如缓慢的凌迟，它的痛苦无与伦比，绝非撕心裂肺可以形容。

猜测历史的玄机会使人心生震惊。数千年来，在远东这片深邃博大的土地上，却从没有长出让一个民族吃饱肚子的庄稼。一部比长城还厚的中国史，其实并非由长城构成，也不是尧舜禹汤、秦皇汉武在扮演主角，扮演主角的永远是土地、粮食和饥荒。揭穿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饥饿史，以及间歇式和周期性的反叛和反叛之后王朝更迭的历史。饥饿的原因也许很多，但归根到底无非三种，天灾，人祸，天灾与人祸交加。如果说天有不测风云，人祸又远比天灾复杂，如暴君、暴政、内战、外战……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饥荒，又无不酿成大规模的农民反叛。

中国农人，土生土长的土命，他们朴实，本分，沉默，隐忍，宽容，和平，只要嘴里还含着最后一粒活命的谷子，他们就决不会把他们的锄头、锄头、镰刀和斧头当作起义的武器。只有当饿死成为必然，更准确地说，只有在饿死和在别的死亡方式中作出最本能的生命选择时，反叛才会成为农人在耕耘之外的另一条活路，换句话说，他们选择了一条比成为饿殍要痛快得多的死路。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当夏人在绝望中发出这样的呐喊，中国历史的某种未来便已确立。这样的反叛从一开始就是决绝的同归于尽的方式，——予及汝偕亡！从此，夏桀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忍的暴君形象，一个必将永远被历史问责的、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而对这种反叛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历史却从未给予公开承认，而以偷换主题的方式，把最终的胜利从造反的农民身上转移到所谓天命所系者身上，这也就是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叙事法则。

在中国，天灾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祸。

说到天灾，中国自然灾害频仍，与它辽阔的版图和复杂的气候有关，没有北旱，便有南涝，这样的自然灾害是一种常态，绝不是让老百姓饿肚子的借口。如果生逢某个“太平盛世”，有圣主明君，有贤相良臣，有对天下苍生有利的“良政”，灾情可以迅速化解，决不至于把老百姓逼上死路。如果天灾一旦遭遇人祸，大规模的动乱便开始了。而在所有人祸中，最极端也最惨烈的无疑是战争。对于中国，最频繁的战争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农人一次次地揭竿而起，也一次次地沦为战争所造成巨大伤痛的最大受害者。

据零星的先秦史料记载，仅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六百余

次，“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只是说出了那个时代的部分真相，到处是饥荒，到处是流民。而在这些饥荒与流民的背后，官府的粮仓里却敛积了大量为了战争而储备的粮食，这从孟子与邹穆公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质问，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管老百姓是死是活，却想要老百姓为你们效力、效命，这又怎么可能呢？应该说，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孟子更有着政治家的冷峻和清醒，这也是他在自己的治世哲学里特别倡导仁政与爱民的基础。南怀瑾在解说孟子的这些话时，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即所谓仁政、良政的时代，天下被仁者爱民的明君所治理，官吏在全国上下广施仁政，而每一个好的政策——良政，则无不对应了人和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让老百姓解决温饱和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于是天下安稳，历史便进入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所谓“乱世”，即暴政、恶政的时代，或是暴君与昏君当政，或是乱臣贼子干政，而老天必将降祸于人间，于是天下灾荒，饿殍遍野，直至引发农民的反叛而天下“盗贼蜂起”，历史也就进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每一次人祸的发生，都是人与时代的错位，历史的大错位。而几乎每一场农民战争，都在满足了极少数幸运者成就王侯将相的野心或雄心之后，天下苍生最终又复归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治一乱，也就是中国历史循环的所谓周期律，这也成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始终无法摆脱的内在困境和所谓周期律，如魔咒般的周而复始，而中国漫长的历史更多的不是递进，而是宿命般的轮回。

二

一头扎进历史，想去探个究竟。

秦王朝，一个想绕也绕不开的短命的王朝。它凝聚了太多的历史症候。秦始皇是一个辉煌的战胜者，他以战争的方式统一了中国，但他所缔造的强大的帝国，却如昙花一现般，又迅速被农民以战争的方式推翻。

对这一段历史的清算，我以为最彻底的是贾谊。

同汉初治世盛行的“无为而治”相比，贾谊一开始便力倡儒家治世的“有为”，但他倡导的“有为”又绝非秦代穷兵黩武和劳民伤财的“有为”。秦帝国从登峰造极的盛世到极迅速的瓦解、覆灭，无疑是他的一块心病。他试

图从秦朝致命的缺点中找到可以让大汉帝国长治久安的秘方，这就是他的《过秦论》。在贾谊看来，秦的最初崛起是因为有“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而到了秦始皇时代，“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此等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登峰造极，然盛极而衰，“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然而这样一个人，振臂一呼，竟然就把一个如此强大的帝国推翻了，贾谊以此而升华出深刻的哲思和伟大的预言：“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如果说这是贾谊对前朝的一次彻底清算，那么他向文帝提出的很多谏疏，无疑都是为汉帝国开出的药方。年轻而短命的贾谊从一开始就渗透出了一种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从贾谊的剖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明君，又是暴君，在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他反而比春秋战国时代的统治者变本加厉地实施苛政暴行，这把农民又一次迅速地逼上了反叛的绝路。“等死，死国可乎？”这种以死亡为基点的选择方式，是死里求生的悲壮，也是最后的决绝。不止是陈胜、吴广，换了任何一个人，在被逼到了绝路之后，哪怕吃上一顿饱饭后立刻便死去，也比成为一个饿殍更让人心甘。

刘邦是这场农民起义的最后胜利者，汉初，天下又发生大饥荒，“凡米石五千”，汉高祖刘邦甚至默许了饥民可以“易子而食”。尽管后世不少文人把刘邦描绘成了一个流氓无赖，但这个村官出身的开国皇帝确实有他很实在的也很清醒的一面，他不摆阔，不讲排场，不大兴土木，“自天子不能具醇醪，而将相或乘牛车”，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为了尽快地医治战争创伤，他采纳了谋臣陆贾所献的《新语》十二篇，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治国理念。应该说，西汉王朝这一新生的政权能够得以迅速地稳定、崛起与繁荣，与它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土地和粮食问题、缓解了饥荒有极大的关系。它的解决方式，就是以“无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政治运作成本。西汉初年的税负，按经济总量的比率估算，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可以说是最低的。我相信司马迁是一个诚实的人，当时天下太平，可以用治世的最佳境界“河清海晏”来形容，汉王朝能够在短暂的复苏之后迅速进入文景之治的空前繁荣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王朝治世的奇迹之一。

以汉文帝为例，他在位二十三年，生活俭朴，经常身着绋衣，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凡做事总从有利于百姓的角度考虑。有一次他要造露

台，召工匠核算，造价需要百金。文帝在心里默算了一下，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便放弃了筑露台的打算。为自己造陵墓，这对于封建帝王可谓第一等的大事，但他却下令皆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装饰。依山筑陵，不起坟堆。在政治上，他“轻徭薄赋，裁减刑律，不动干戈”。他的儿子汉景帝深受父皇影响，司马贞说：“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从汉初到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时间里，因为君臣共同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共同创造出了“文景盛世”的太平景象，从京师到偏远之地府库都装得满满的。京师之钱累巨万，穿钱的绳子腐烂了，钱散乱得无法数清。“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烂不可食。”而这一非凡的时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的典范。

但也有人看到了这种太平盛世之下蛰伏的危机，贾谊。如果要谈到粮食问题，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还是贾谊。在贾谊为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中，最令人惊喜的还是他的《论积贮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粮食为主题的纲领性文件。粮食，唯有粮食，永远是国之命脉。贾谊从粮食的储备——“仓廩实而知礼节”，论及粮食与政治和民生的关系，“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在我所知的范围内，他第一个立足于战略的高度宏观地来看待粮食问题，这里虽难免有偏激之处，但他不断的强调无疑是要引起最高决策者对粮食问题的高度关注，“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不仅是针对汉文帝，而是在给世代代的统治者敲警钟，“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对于这样的文字，你要睁大了眼睛读，才能感觉到他辽阔的眼界。或许，只有最有使命感的人，才能感觉到这样的“大命”。也正因为有贾谊的存在，我更相信，文景之治的辉煌，不可能纯粹是道者的“无为而治”，还应该加上贾谊的“仁政”，是这两者交加而共同创造出来的。也为汉武帝时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秦、隋是两个极为相似的短命王朝，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大运

河，后世评说，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的两大壮举，祸在当时，功在千秋，这是从宏观历史的视角来看问题，前者是为了巩固边防，后者一举打通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命脉。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所谓宏观历史大多是从国家意志出发的，忽略和抽空了具体的生命存在。秦始皇和隋炀帝都不是昏君，或许正是出于某种强大的国家意志，他们才如此不顾老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到处抓夫丁，服苦役。在隋炀帝时代，断手断腿的残疾人，竟然成了最有福气的人，很多人自残手臂，称之为“福手”，自断腿脚，称之为“福足”，以此来逃避苦役。这种辛酸而悲惨的历史，或许只能在中国历史中才可以找到。隋朝的灭亡和秦朝如出一辙，而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只需把司马迁那句“天下苦秦久矣”改掉一个字，天下苦隋久矣！

一个苦字，一下就揭示出其共同的本质。

而对于这样的历史，我总想下意识地迅速翻过，越过纷乱的数代历史，翻到盛唐。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朝的贞观之治，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的相似性总让人吃惊，秦与隋，秦之后的汉王朝和隋之后的唐王朝，几乎就是不同时空中的复写版本。

唐朝开国面临的处境和西汉初年一样，如何让流散各地的老百姓回归土地，又如何让老百姓把力气使在土地上，是摆在这个新生政权眼下的第一件大事。唐高祖李渊在位时间不长，李世民虽不是唐朝的开国皇帝，却是这一强大王朝的真正奠基者。他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治国以儒家仁政的“以民为本”，深知“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位之初，他便下令天下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天下百姓真的就像天生地长的草芥一样，一旦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就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便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故事，也和汉文帝版本如出一辙。汉文帝为了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放弃了为自己造露台的打算，唐太宗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也不愿意劳动老百姓为自己新修宫殿。为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还下令以合并州县来革除“民少吏多”的弊端，减少行政运作成本。我看历史上的这些所谓明君，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了不得的举措，无非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多考虑一些，减税，减负，减徭役，天下苍生就安稳了，繁荣升平的盛世出现了。奇怪的是，像汉文帝、唐太宗的皇帝怎么就这样少呢？难道从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那么难吗？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作出沉重反思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唐贞观年间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道盛世都无法比拟

的。李世民以民为本的仁政，以及他的勤政、睿智、胸怀和气度，构成了圣主明君必不可少的综合素质，也成为后世君临天下者效法的杰出典范。上行则下效。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圉圉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未见有宫廷或朝臣的倾轧，未见有疯长的贪婪与邪恶，未见有饥寒起盗心，整个社会，从朝廷到苍生，都处在一种安详、和谐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而文学艺术也得到了极大的繁荣。“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长安是李白的梦乡，是辈辈不绝的无数诗人的梦乡。一想起诗，就会想起唐朝，梦回唐朝。

翻检《旧唐书》、《新唐书》，面对那一派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甚至感觉不是在读历史，而是在读一个夸大了的政治寓言。一个封建帝国，真的能经营出这样一个极度理想化的盛世吗？我需要找到一个诚实的人来作证，不是李白，而是杜甫。杜甫并非生活于贞观盛世，而是唐朝的另一个盛世——开元盛世，而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才能为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作出雄厚的铺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这是杜甫的诗，他的诗是诗史，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杜甫是有一说一的实诚人，于是我相信，他看到而且说出的，一定是真相。

看来，以礼制文化为载体的仁政、良政，的确可以达到某种几近完美的盛世。尽管后世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描述足以用功高盖世来形容，但李世民到晚期也变了，不再那么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也不再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他开疆拓土的征伐却并没有激起老百姓的反叛，这是因为他已经积累起了太多的资本和财富，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为自己晚年的错误也为自己的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

三

看了王道盛世，再看王朝末世。在官方的修史者眼里，总把王朝末世归咎于某一个末代皇帝的昏庸。这是最简单的问责方式，你必须找到一个人来为某一个帝国的覆没负责。

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从来没有人反思过这些王朝的典章制度上是否出了问

题。而从具体的事实来看，具体到个体生命的存在上来发现，皇帝也是人，在高度专权、集权、极权的体制下，一个人能够长久地保持理智上的清醒，并且以高度的责任感来自觉地约束自己，这样的圣主明君的确是少有的。就像唐太宗，他到了晚年也不免会犯错误，而他一旦开始犯错误，就没有任何人有阻止他或把他重新拉回正轨的力量。谁都知道唐太宗手下有个魏征，但如果你相信魏征可以制约他未免就太天真。魏征只是他身边的一个提醒者，确切地说是他自律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他自己。这样的纳谏，本质上还是属于自律的范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自律，他完全可以变成又一个夏桀、秦始皇或隋炀帝。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万个魏征也没有办法阻止一个皇帝怀抱着他的国家往火坑里跳。

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与仁政的危险，高度的危险，天下安危从来没有制度上的保证，而全凭某皇帝脑子里随时可以蹿出来的一个念头。以个体生命占有时空的短暂和局限，而让他负起如此宏大的责任，这种压力太大，反差太强烈，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直处于危机四伏的处境之中的原因之一。而历史上，像唐宗宋祖这样的明白皇帝又实在太少，而哪怕再明白谁也保证不了他一生都不犯错误。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之下，人性的本能最后都会在极度膨胀之下，为所欲为地走向另一种极端。

中国历史上也许真的有所谓昏君存在，但更多的时候，反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昏”，而是他们太明白，太有抱负，太想干出一番事业。如果你仔细读过中国史，如果连历史夹缝里的文字也不肯放过，你一定会发现，五千年来的更多的时候，酿成人祸的都不是这些皇帝有什么负面的想法，而恰恰是因为某种良好的出发点，譬如说王莽和他的新政。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著名改革家，王莽是其中之一。

让我们回到西汉，西汉末年，当强大的汉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人们一般把西汉的灭亡归咎于两个人，一个是荒淫无度的昏君汉成帝刘骘，再一个就是篡权的王莽。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基本上不被正统的修史者所承认的朝代——王莽缔造的新朝，即所谓“新莽”时代。王莽无疑是西汉的掘墓人，如果他成功了，他开创的王朝能够传承数代，他也许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国皇帝，篡权也就变成了上承天命下应民心的合法行为。但不幸的是，他既是一个开国之君，又是一个亡国之君，他开创的这个短暂的新莽王朝，也就成了两汉之间的一个插曲，一个历史性的恶作剧。

对于王莽这个人，如果能够以正视的眼光来打量，你会发现这个人并不缺少做一个圣主明君的综合素质。他虽是外戚出身，但根本上，他还是一个儒

生，一个读书人，他确实像平常的读书人一样，苦读儒家经典，结交天下贤士，做事谨慎小心。人们都说，在众多的王家子弟中，数王莽最好。他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他儿子杀死家奴，尽管不过是死了一家奴，王莽仍然逼其儿子自杀以偿命。——而王莽的一切好名声，在他走完自己的全部人生历程和历史性进程之后，都将被后世指斥为“伪善”。但一个人要“伪善”到如此境界还真不容易，哪怕仅凭这种“伪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人。

王莽开始执掌国柄正好是西方以公元纪年的开始，历史选择了王莽。西汉王气不振，汉成帝死后，不出十年，就换了三朝天子。天公也不作美，中原接连发生了旱灾和蝗灾。但西汉走向崩溃的更深层的原因，还是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一旦遭遇灾荒，老百姓便没法活下去，反叛不断。王莽摄政时期，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带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太皇太后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二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又推辞了。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王莽越是不肯受封，越是有人要求太皇太后封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加封王莽的人共有四十八万多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三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但这都是表面文章，摆在王莽面前的是如何化解眼下的矛盾，怎样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王莽居摄二年，有天下名士和文武百官借各种名目不断向他劝进，还有很多人进献天书符命，到了这个份上，王莽想不做皇帝都不行了，便接受孺子婴禅让，完成了登基之前的最后一道合法性手续，正式称帝，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当皇帝的先河。

或许是太想要革故鼎新，也太想天下安定，王莽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

王莽做了真皇帝后的第一个举措，是从土地开始下手的。他找准了当时土地兼并的祸根——土地私有化。为此，他打着托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发动了土地国有化运动，“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此举对土地兼并有如釜底抽薪。然后，他又下令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作为商品买卖。应该说，此举也是既符合仁政也符合人道的。此外，他还推动了一系列经济的、金融的改革，试图以改革币制的方式来平抑物价。为了保证中央的政策能够得以贯彻，他还推行了“五均六莞”之策，即在京师常安以及全国五大城

市设立五均官，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借以排除地方干扰。无论我们对这个人抱有怎样的偏见，应该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王莽出台的这些新政，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春秋井田制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一政策首先就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的强烈反对，而这些人正是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王莽试图以铁腕推行自己的新政，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尖锐的对抗，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而这种强制性政策即便再强硬，也无法抗拒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土地兼并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引起社会更大的混乱。

且不管历史对王莽的评价是否公道，历史有时候真的就像恶作剧，王莽费了那么多心机，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谁知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大臣们也与他貌合神离，眼看这江山在龙庭下摇晃，生生地把他弄得吃不下饭，每天仅能喝一点酒，吃一点鱼。好在大司空崔发是个忠臣，向他献上一个妙计：《周礼》、《春秋》上都记载着，国家有了大难，可以恸哭向上苍哀求，《易》称“先号咷而笑”。王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亲自撰了一篇《告天策文》，然后率领文武百官来到长安南郊，大声痛哭告天求救……

王莽泪如雨下，直到哭得昏死过去。王莽爱国，爱的是自己的国。为了坐上龙椅，他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连老婆也因此而发了疯。他既然是天的儿子，天难道不照顾他么？“皇天呀，你既然命我做皇帝，为何不把盗贼们殄灭了？如果你认为我王莽有错，就用雷霆把我击死吧！”光他一个人哭，还不够。王莽又命老百姓们都去哭，谁去哭就给谁一碗稀粥喝，哭得最凄惨而且还能够念诵《告天策文》的，一律提拔为郎官。想必中国的老百姓都有恸哭的天赋，有五千多人因恸哭而被授以郎官。但天还是没有翻过来，王莽身穿皇帝袍服，手持虞帝匕首，席地而坐，脑袋却被一个商人割走了。

这样的恶作剧，在上下五千年轮番上演，勾画出了一部血腥的中国王朝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或许，只有在我们不再寄希望于清官贤臣、圣主明君时，天道才会公正，老百姓才不会为了一碗稀粥去给王莽之流哭天了吧。

四

我在前文说到，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有人试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而事实上灾难的数字永远无法统计，就像有多少人饿死了一样无法统

计，越准确就越离谱。但在历史的夹缝中，依然可以大约知道灾难发生的频率，天下苍生苦难的深重——

据《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据《晋书·食货志》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据《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

据《隋书·炀帝本纪》载，大业八年，岁大旱，又大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据《唐书·五行志》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

据《元史·五行志》载，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人……

灾难，灾乱，这些刻板印刷的汉字，没有一个字是活的。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连绵纵横的战争、洪水和干旱，轮番制造着连绵纵横的饥饿，一个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着饥饿的血液。时光如此缓慢，每一页，都沉重得让我难以翻过去。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所谓历史的漫长，有时候其实与时间本身无关，只因为太沉重。一代代的农民起义，一些脚印重叠着另一些脚印。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他们的终极关怀只有一个，活命的土地和养命的粮食。几乎所有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都与粮食有关，而每一个与吃饱肚子有关的口号都是那么朴素而震撼人心，都在饥饿中演变成一个时代的怒吼。

隋末农民起义时唱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口号，——为什么有的人有饭吃，有的人饿肚子，根本原因就是“贫富不均”，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干脆。同样发生在宋朝的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的也是同样的口号：“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而明末李自成起义也延续并更加突出了宋代农民起义农民对“均田、免粮”的渴望，这是农民最朴实也最天真的理想，“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这种“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对叛乱的农民无疑极具诱惑力，到太平天国，一变而为“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他们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当洪秀全以天父的名义提出这些个理念时，他们远在德国的同情者马克思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对洪秀全的革命寄予厚望，他认为洪秀全的革命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茶叶的出口，而茶叶是当时欧洲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洪秀全革命的蝴蝶效应是，把中国革命的火